

延乔路和“延乔”纪念证

戴健

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播出，合肥的延乔路最近很“火”。作为延乔路命名的亲历者，本文作者回忆了延乔路命名的前后，并联系到67年前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延、乔”并列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以烈士英模为街区命名

1955年，安徽省会合肥定下“以省内地名适当对应方位命名城市道路名”的规则。比如市区以东向西的淮河路、长江路为脉络，阜阳路放在“淮河”以北，桐城路放在“江淮”之间，芜湖路放在“长江”以南，大致上如此。那时候没想到合肥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到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县名、河山川名甚至主要集镇名基本用罄，道路命名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有必要突破创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中，有规划专家提出以黄山七十二峰命名道路的新思路，市政府主要领导主张用繁华、锦绣、方兴命名主干道，寓意“开放开发、再造新合肥”的美好愿景。这些意见形成决议后构成合肥经开区道路命名的框架。

那时民政部门每隔几年开一次会，集中命名一批道路。而期间规划部门在规划道路时，已顺手在蓝图上取了名，建路时已竖了牌子。2004年合肥市决定成立一个非常设的地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在道路规划时就介入命名。市政府聘请安徽大学校长、古文字学家黄德宽教授为合肥市地名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我为副主任，牛耘、武彪、夏有才等为委员，根据道路规划建设需要适时拿出命名意见。但主持安徽大学校务工作的他（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亦表示，因为在太忙，他就不参加了，委托我主持。

合肥经开区欣欣向荣，市里决定将毗邻的肥西县桃花一部分土地拿出来，由经开区和肥西县合作共建，这样桃花镇的路名也就拿到市级层面命名评审。这一带位于合肥西南，于是开发过程中新建的道路按命名规则征询地处安徽西南的安庆市意见。安庆方面进一步“挖潜”，报来他们那里一些寓意好的有文化底蕴的地名，但也提供了一组烈士和英模名，如陈延年、陈乔年、王步文、邓稼先、程长庚、严风英等，希望能用在省城合肥的道路上。

“延乔路”的诞生

在讨论经开区和肥西桃花镇新增



长璞（前排）等人在陈独秀墓前

道路取名时，遇到两个问题：一、按合肥市地名管理条例，“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这“一般”也能理解为必要时可以突破。我在主持地名专家讨论时提出，各地都有少量名人做路名，如许多城市都有中山路，北京有张自忠路，上海有（戴）安澜路，黑龙江哈尔滨有（赵）一曼路，江西南昌和赣州有（詹）天佑路，我们合肥有纪念烈士的习友路，而高新区命名独秀山路也寓含纪念陈独秀的意思嘛，安庆方面的意见可以考虑，“两弹元勋”邓稼先、京剧鼻祖程长庚等名人做路名可以为合肥“加分”。二、陈延年、陈乔年二烈士做路名，但一个城市应当避免用昆仲俩的名字做两条路名。

议到这具体细节时，刚从经开区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一位老同志主张把陈延年、陈乔年合成一条路，叫“延乔路”，可以理解为兄弟情深，同为烈士，不宜分开。专家们觉得很好，形成统一意见，随后上报，延乔路等一批路名在2013年合肥市第四批道路命名公示后确认公布。其中，位于合肥市经开区和肥西县一带的王步文路、邓稼先路、程长庚路、严风英路在延乔路以西排列，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

作为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40年前我在寻访陈独秀墓时，曾写下嵌名七绝：

陈公仲甫已长眠，独把说评留世间。
秀外慧中风水地，墓东十里是集贤。

随后我又通过系列考证，把对陈独秀生年的辩证文章发在上海《解放日报》的《未定文稿》和《合肥晚报》上，指出《辞海》舛错，《新华文摘》转载，《辞海》再版时订正。我还在主持安徽名人馆建设过程中，把他们父子三人列入一组中，精心设计布展，放在醒目位置。合肥是省会，包括路名在内的地名要延续厚重

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延乔路通往繁华、锦绣、方兴未艾，初心得以升华，使命更显担当。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延乔路的命名树牌，如今产生当初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这倒让我想起两件事：

一、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抵达安庆后，曾向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询问陈独秀后人情况。傅大章报告陈独秀三子陈松年还在当地，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出卖房产维持生活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话：“陈独秀后人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有此指示，安庆方面立刻行动，市委统战部开始给陈松年按月发放30元生活补助金；在确认了陈松年两位哥哥的烈士身份后，颁发了光荣纪念证；凭烈士身份，陈松年被安排到窑厂工作。我还记得一份安庆窑厂60多年前的会议记录，陈松年作为会计参加，也算是窑厂“干部”了。陈松年后是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二、30多年前我在安庆陈松年家宅采访他时，看到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查陈延、乔年两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

“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主席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

这份露白为“永垂不朽”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延”“乔”竖排并列。冥冥之中，合肥的延乔路和它契合？

陈延年、陈乔年和赵世炎等在1927年、1928年先后就义于上海龙华，墓亦在今龙华烈士陵园。皖籍革命家张恺帆（生前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当年被关押在龙华监狱时，曾写下绝句《狱中随感》：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由于这首诗留在牢房双人床上铺内侧的墙上，狱警未发现，以致张恺帆虽被营救出狱，诗却误收入共和国十年大庆前夕出版的由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而闻名于世。张恺帆的这首“烈士诗”如今镌刻在龙华烈士陵园碑林区。鲁迅生前致颜黎明的信中有“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能去的”。那是对龙华桃花的另一解。感于此，步恺老诗原韵仿作一首：

延乔千古显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
后代鲜花先烈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莫愁前路少知音，今见后昆怀故人。令人欣慰的是，合肥延乔路将以“三园、一线、两延展”的规划思路改造提升：在路南公园区域建设烈士生平公园，在路中校园区域建设传承园，在路北广场区域建设纪念馆；在主路一线打造红色文化街区；将路分别延展至繁华大道和汤口路、集贤路方向。延乔路小学已经命名。延乔路将和烈士英名一起彪炳史册，传诸后世。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合肥市政协原文史委主任）

是全部依靠。

1932年的秋天，哈尔滨洪水肆虐，变成汪洋泽国。在暴风雨夜里，萧军终于把萧红从困境救出来。在患难中结为夫妻。在坎坷的人生旅程上，这对文坛眷侣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自此，萧红有了坚强的依靠。他们结婚时，没有戒指，没有仪式，这三首情诗便成为萧军送给萧红的定情物。有情饮水饱，此时他们物质生活是匮乏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三首短诗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映射出萧军和萧红之间最真挚最质朴的情谊。

情诗虽寥寥几句，但其中的情绪表达，旧体运用，文字掌控，都十分自如，令人感怀。将甜蜜恋人的心中所感心中所念都囊括其中。“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萧红和萧军就是一对甜蜜且苦着的鸳鸯，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出彼此的爱和甜蜜。此后的日子里，虽时局动荡，贫穷、饥饿、疾病接踵而至，但在命运的渡口，他们仍紧紧相依，相濡以沫。无论苦辣酸甜，都携手并肩。在萧红病倒在医院却无钱医治时，萧军为她大闹医院，为她写下“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的美好诗句。她为他扎起围裙，煮饭烧菜，在呼啸的风雪中等他回家。而萧红更是在爱人的鼓励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王阿嫂之死》为她的文学之路铺垫了一块有力的基石，自此，她把民族灾难、历史疾苦和个人不幸，统统倾注笔端，如万斛泉涌，不择而出，轰动中国文坛，萧红的文学之树，缓缓开花，一部《跋涉》更成了他们爱与生命的见证。那段时光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即便穷苦，却甘之如饴。

萧红萧军，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相扶相持，不离不弃。虽然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但那段真挚的爱情依然是一道绚丽的虹，映照他们彼此的记忆，也映照整个中国的文坛。

陈寅恪讲课时的“笑”

杨建民



翻译家许渊冲抗战时考入了“西南联大”外文系，可对他系著名教授的课，也去旁听。在大二学期初，他旁听了陈寅恪教授一堂“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课，留下了一些有趣印象。

陈寅恪在学校极为有名，学子们有传说，譬如说英国牛津大学请他讲学，因为战争原因，没有前去等，这当然形成光环效应。许渊冲将此记入日记。具体说到讲课，许渊冲在很短时间，听到陈寅恪几次大笑，他说陈寅恪讲课：“两眼时常闭上，一只手放在椅子背后，一只放在膝头，有时忽然放声大笑。”这个动作很形象。陈寅恪的课，每周只是两小时，可他只讲一小时，而且每两周来一次。

陈寅恪的课，多给研究生上，所以许渊冲说“因为研究生注重课外阅读。他（陈）说图书馆无书可读，只好沉思默想，这时大笑一阵……他说同学有问题可以问他，如答不出，就

说不知道。中学老师这样说要被赶走了，但大学教授如果什么问题都答得出，那还需要研究做什么？这时大笑。”

陈寅恪还说，提问题“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项下铃谁解得？解铃自然还是系铃人了。这时他又大笑”。对问题，陈寅恪还有要求：“也不可以太大，如见帆动，问心动不动？这是唯心唯物的大问题，回答不可能精确。最好能提点小精悍，承上启下的关键问题，如杨贵妃就是唐史的一个关键，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这样的要求，对学生做学问，研究课题，也是很好的启示。

陈寅恪在这节课最后说：“专回答不讲解，中国大学还行不通，所以每两周讲一次，讲的材料不是正史，而是稗官野史之类。”这些，陈寅恪是启发学子要广博泛览，不被所谓“正史”拘牵。听了陈的课，许渊冲评论：“陈先生讲得有味。无怪乎目中无人的刘文典先生只佩服他一个人了。”



傅斯年投稿《大公报》

周惠斌

1934年，《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为拓展言论广度，扩大报纸影响，决定开辟“星期论文”专栏，邀请学界名流加盟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8人。据《〈大公报〉史》统计，自1934年1月至1949年6月，计有200多位各界贤达先后撰写了750篇言论，其中，傅斯年共发表22篇，成为投稿最为积极的作者之一。

傅斯年为“星期论文”撰写的文章，内容集中在“国内政治”和“国际评论”两个方面。1934年11月25日，他在《政府与提倡道德》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不是政治口号，政府提倡道德，应引进公民契约等理念，培养明辨是非、服从公义等公德，政治家要以身作则，否则必然毫无成效，徒增许多伪善。文章最后指出：当下社会

“国难之急，民困之极”，然而“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傅斯年联络任鸿隽、储安平等20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津版“星期论文”专栏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指出：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蹈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傅斯年还在《大公报》重庆版“星期论文”专栏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阐述了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充分显示了傅斯年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严谨的论辩和炽热的爱国激情。



曹禺何以“江郎才尽”

刘效仁

曹禺（本名万家宝）23岁时就写出了话剧《雷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一经发表，便誉满天下。

在女儿万万笔下，曹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不只具有天赋，更是后天读书研习、厚积薄发的结晶。曹禺自道：“写戏没有别的路子，更没有捷径，必须认真地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剧本，国内的国外的，从关汉卿到戏考，到外国的各种流派。”同样爱戏剧的翻译家英若诚，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有能借到的每一本中外戏剧书籍的借书证上，都看到了“万家宝”的名字，是为佐证。

30岁左右，曹禺即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日出》《原野》《北京人》……可直到1978年，他才写出《王昭君》。一个颇富才华的剧作家，何以“江郎才尽”？

“文革”期间，曹禺的作品成了同情资本家的“大毒草”。曹禺曾写道：“我的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抓去，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此后，曹禺虽然“活

着，却已经不再是自己”。

作为至交和师长的巴金，多次写信鼓励他，“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你应当记住，你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呀！”其实，曹禺也试图努力过，有了一张张人物表，打了那么多的草稿，最后都不了之。女儿问他为什么写不下去，他的回答是“就是觉得可能出错”。用万方的话说，“关键是他开始怀疑自己，他的根基被动摇了。”

曹禺在给巴金的信中也说，“我最大的痛苦是自己心里得不到安静，时时刻刻折磨自己，用往事折磨自己”，并让陈用安眠药“那剂量对任何人来说，还是惊人的”。由于过度用药，他还曾在一次隆重的场合昏死过去。曹禺也曾萌生“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的想法，幸好万万闯了进来，“你要不来我就跳下去了。”第二天早上，他说：“跳楼，只是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出去啊。”

后来，被重新戴上种种桂冠的曹禺，开始用繁忙的公务麻醉自己。“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对此，女儿万万是理解的。1996年12月13日，曹禺因长期疾病辞世，享年86岁。



自学成才的金克木

姚秦川

金克木字止默，笔名辛竹，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与季羨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令人敬佩的是，金克木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竟然还是自学成才。

1935年，23岁的金克木经人介绍，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的他只有小学文凭。金克木明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看似简单，但想要做好这份工作却不容易，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充电”。虽然北大图书馆的书应有尽有，不过，金克木也不知道哪些书才能帮助到自己。

经过思忖，金克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悄悄地将目标盯到了那些借书人，打算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导师”。当时，给金克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从十几公里外步行起来的

教授。每次来时，教授都会用右胳膊夹着一个帆布包，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纸，随即将纸往借书台上一放，自始至终，那个教授都一言不发。

金克木接过那张纸一看，发现上面全写着一些古书名，于是，他暗自将这些书名记在心里，待这位教授走后，金克木赶紧拿出本子，将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到一张纸上，然后等有了空闲，便照着书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阅读，同时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

浪抛红豆结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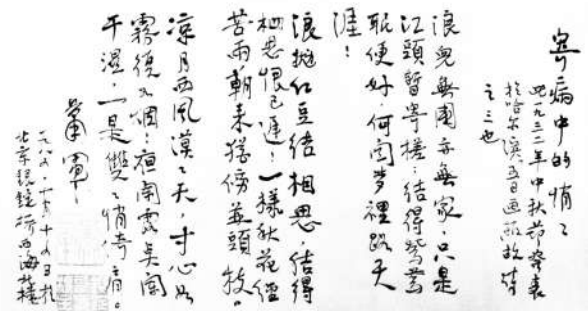
——1932年中秋萧军寄萧红情诗三首

王十

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
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
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傍并头枝。

凉月西风漠漠天，寸心如雾亦如烟；
夜阑露点栏干湿，一是双双倩倚肩。



1932年中秋萧军致萧红诗三首，发表在1932年的哈尔滨《五日画报》，此为萧军1989年重书。

军在一堆乱纸中无意觉得萧红随手画的半幅画和一首小诗《春曲》，便擦起了萧军内心的柔软爱意，他当即决定“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而当时的萧红，也被萧军踏入这间阴冷霉湿的小屋时所呈现的豪气鼓舞了，满足了萧红在短暂的生命旅程中对于“爱”的憧憬与追求，让她扬起了“只有带着浑身伤痕的战士互相会见时才能感受到的欢快”。对身陷囹圄的萧红而言，萧军是春天，是希望，

1932年的中秋，中秋圆月的漫漫清辉，激发了萧军的创作灵感，他写作了三首饱含爱意的诗，诗中所蕴含的情致，是很深浓的。

1911年，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出生于东北的一座小城呼兰。时光倥偬，萧红用她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一生，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萧军是萧红短暂的生命中浓墨淡彩的一笔，也正是萧军的引导和鼓励，成为萧红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契机。而他们的爱情，犹如一首跌宕的歌。

初遇被萧军回忆为“不平常的会见，平常的结合！”在萧红落难的小旅馆里初次相见，二人便生出爱恋。萧